

数字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基于《资本论》及手稿

郑清清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资本拜物教历经商品、货币拜物教形式, 发展至《资本论》原始语境尚未具体涉及的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拜物教阶段, 引发了不限于遮蔽劳资矛盾、掩饰生产剥削的新问题: 虚化数字主体性、加剧数字霸权等。应其发展之势也大致形成了两种批判路径: 以卢卡奇物化批判为代表的存在论批判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前者从整体物化现象直接过渡到总体性批判, 自然无法规避彻底抵制数字的主观主义宿命, 唯有后者才能精准指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性, 并明晰数字的工具性, 为探索服务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数字共同体保留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吸纳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既是契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具体尝试, 也是动摇数字拜物教根基的有力举措。

关键词: 数字拜物教;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 卢卡奇; 数字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6.02.003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6)02-0020-09

数字拜物教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而逐渐形成了抽象统治之势, 引发了一系列表现形式异于传统拜物教的新问题, 也引起了学术界在理论立场、问题关注、分析视角等方面的热议。透过数字拜物教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形式及其引发的超传统、超常识的系列问题, 回归到它的本质属性之中, 不仅能够厘清新型拜物教的性质, 还能够再次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也就是说, 数字拜物教虽然超出了《资本论》的具体问题范畴, 但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前提, 仍归属于资本拜物教范畴。因此, 回归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立足于《资本论》及马克思手稿(尤其是“机器论片段”)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

在矛盾及其历史性、暂时性、过渡性的科学分析, 才能形成对数字拜物教的精准批判并保留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 才能为重建数字所有权、构建数字共同体、走近真正的共同体奠定理论基础, 也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数字时代下的融合努力提供理论支撑。

一、数字拜物教: 资本拜物教的新形式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遍渗透, 资本主义呈现出“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发展阶段, 并产生了新型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一般数据取代货币成为数字拜物教的核心, 在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引导下, 构成

新型抽象统治的工具。数字拜物教不仅延续并加深了传统拜物教对劳资矛盾的遮蔽,还引发了数字主体性丧失、数字霸权等新的社会问题。

1. 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与数字拜物教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即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47},并基于此将商品作为分析起点。实际上,不仅商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商品拜物教也是探究马克思三大拜物教批判的开端。使用价值并不能赋予商品以拜物教属性,而是商品体现一般人类劳动的交换价值才使其具有纯粹社会的价值对象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1]89},即商品的可交换属性成全了商品的物质外壳对其所内含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遮蔽。换言之,商品拜物教之所以能构成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起点,就在于它揭露了拜物教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

又因为人类劳动只有“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1]65},所以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内容必然逐渐清晰地呈现为具象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马克思继而指出,货币拜物教只是商品拜物教进一步抽象化、普遍化的发展形式而已。可见,对一般价值形式的探究明晰了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的发展历程,也在把握住拜物教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联系的前提下触及了资本拜物教批判的内核。但唯有深入至资本拜物教这一完成形态中,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为数字拜物教批判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因为货币增殖而非货币储存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离开或割裂由生产、流通和再生产构成的这一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社会总体运动,就无法解释拜物教问题形成的现实基础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影

响。以《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流通过程的阐述为中介,《资本论》第三卷所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视角,也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导向成熟阶段,尤其是在对生息资本的分析上,马克思直接指明:“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的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2]440},换言之,在生息资本上,充满剥削的生产过程和风险密布的流通过程都被遮蔽了,资本的神秘化发展到最后抽象的阶段,而对现实矛盾的去蔽正是拜物教批判的夙愿。

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现如今盛行的拜物教已经跨越了《资本论》原初语境中涉及的商品和货币拜物教阶段,发展为与资本拜物教联系更为密切的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3]18}。因此,厘清从商品、货币到资本拜物教的发展逻辑是定位数字拜物教不能规避的理论工作,换言之,随意将数字拜物教与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并列,只会人为制造出不必要的理论问题,削弱《资本论》中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数字拜物教虽然超出了《资本论》的原始语境,但是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定,作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产物,其形式的抽象性、普遍性和隐蔽性相较于资本拜物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仍然归属于资本拜物教的范畴。因此,立足《资本论》的基本理论立场,吸收马克思三大拜物教批判(尤其是资本拜物教)的思想成果,并联系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才能形成数字拜物教批判的成熟理论视野。

2. 数字拜物教的核心:一般数据

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3]195}。以一般数据为核心,数字拜物教应运而生。或者说,一般数据取代商品和货币成为资本拜物教新的表现形式,构建新型抽象

统治样态。

而一般数据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字拜物教的核心内容,在于其背后的生产活动和剥削关系。个体在网络平台上生产的数据并不直接构成某种生产资料,这些庞杂的数据只有在数字平台这一载体中,借助云计算进行标准化处理,才能为产业或金融资本所利用,成为数字资本家谋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形式。也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才能够说一般数据具有了资本的属性^[4]。

个体用户在网络活动中生产的原始数据经过平台处理形成一般数据,一旦为少数个人或企业私有,数字资本家就会利用手机、平板或电脑等终端设备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植入个体日常生活之中,带来更沉重却更隐蔽的剥削。就部分数字劳动为例,个体用户在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上所上传的视频大多为个人制作,但却为平台无偿占有。这种无酬劳动得以存续不是基于工资,而是基于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等量化关注度的数据标准。关键在于,这些消耗个体用户大量时间所积累的数据信息未支付分毫却为平台所有者创造了巨大的收益。可见,当一般数据成为支配个体生产生活的神秘力量,个体在娱乐中劳动,在被剥削中意淫自由时,数字拜物教就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了。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拜物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统治的新形式。商品、货币、资本或数据之所以能够构建起支配人们生产生活的抽象统治结构,就在于其扎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索恩-雷特尔指出,“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现实抽象”,是“一种社会本性,其起源于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空领域之中。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产生了这一抽象”^[5]。实际上,一般数据同一般价值形式、一般生产一

样,也归属于“现实抽象”的范畴,它产生自个体用户在平台上的社会行为并反过来对其进行渗透、引导和强制。因此,对于扎根于社会生活的一般数据所构成的抽象统治结构而言,意识形态批判只是对数字拜物教的表层批判行为,只会停留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被无意识剥削现象的描述之中,而唯有延伸至数字拜物教作为根基的现实的社會关系之中,对其批判才成为可能。当然,这也需要以数字拜物教所造成的更为具象化的社会问题为媒介才能达到。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数据作为数字拜物教的核心,在其背后生产活动和剥削关系的推动下,发展为抽象统治的新形式。实际上,这一过程也正是数字在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上成为生产要素,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运动,并引发更抽象、更普遍、更隐蔽的阶级矛盾的发展趋势。数字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要素,清晰地揭示了资本拜物教发展至数字拜物教阶段所具有的新特征,这是资本逻辑运行中所依附载体的发展结果:从商品到货币再到数字。换言之,资本承载形式因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和普遍性要求,逐渐呈现出被剥削者愈发难以意识到的抽象性,甚至是虚拟性特征。随之而来的也就是抽象统治的深入以及对其反抗可能的渺茫,这都在数字拜物教所产生影响的新形式中得以清晰呈现。

3. 数字拜物教的影响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与世界构建联系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以身体为媒介同外界直接关联已经不是唯一的途径。此外,还能够借助于在网络平台上建构起来的数据集合体——虚体。进一步来说,虚体虽然是相对于身体提出的概念,但却不是反映身体的产物,它在数字空间中具有身体所不具有的“存在感”“现实感”甚至“真实感”。具体来说,个体用户

通过符号语言构建了一个包含状态、行为、标识的集合,以此存在于赛博空间或互联网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以身体参与到网络空间当中,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数字化的中介才能作为这个空间的存在物在其中存在,而通过这样的算法形成的数据包就是虚体”^{[3]104}。相反,当我们抛弃社交、游戏、消费等平台的ID,游离在网络活动空间之外生活时,却陷入一种被真实生活隔绝的空虚境况,仿佛线下活生生的个体竟成了“虚体”,而网络世界里一个个注册而来的“数据包”才是“实体”,又仿佛没有网络就没有“领土”,始终存在的只有网络或网络结构,只有在自身之外,存在才具有社会性^[6]。数字架空了原本真实的生活,构建了更具真实感的另一个生活空间,个体在被吸纳、被引导、被重塑中愉快地移交了主体性。

实际上,当数字作为抽象统治结构的内核被推向神坛,对价值、意义的多寡甚至存在与否等问题进行审判时,个体主体性的丧失只是这场悲剧的开端,隐藏在其背后的是普遍且剧烈的劳资矛盾和新型剥削,其中,数字资本主义特有的剥削形式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所在。个体用户在网络平台上的一切社交、娱乐和消费行为实际上同时也是新型生产行为,即使这一属性甚至不为主体本身所意识到。个体用户的搜索、阅读、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等行为都形成了有价值的数据,构成了流量与热度的基础,而这些数据却为少数企业所垄断,并依据其投放广告、引导消费,聚集流量、创造需求,实实在在地创造了巨额的剩余价值。但作为剥削者的数字资本家却隐匿在网络世界的欢声笑语中接受着被剥削者的供奉,数字劳动者以无酬劳动供养数据,甚至以工资喂养流量,塑造出《资本论》原始语境中尚未具体刻画的新型无产阶级形象。这反映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特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极为模糊、剥削形

式极为温和、剥削主体(斗争对象)极为隐蔽、被剥削者的反抗意识极为薄弱等。

问题的关键在于:遮蔽劳资矛盾、掩盖新型剥削并不会使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和资本家维持着虚假和平,数字也不会一直静置于神坛之上接受供奉,数字资本的勃勃野心必然以数字霸权的形式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在数字拜物教中,数字权力而非数据本身才是被崇拜的真正对象,数字拜物教必然迈向少数掌握海量数据者对绝大多数个体用户的支配阶段。具体而言:数字资本借助网络媒介改造民众政治参与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使其潜意识被数字化,脱离现实;数字资本还将传统媒介的网络话语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过滤民众言论并定向灌输政治信息;最后,数字凭借其超强的渗透性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政治需求数字化,逐渐剔除不受它控制的“民主区域”。数字平台看似为民众提供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实则并不服务于大众利益;看似展现了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实则更精准地服务于数字资本家阶级,建立起对新型无产阶级的数字霸权。可以说,资本主义霸权的现实毋庸置疑,但它的历史基础、社会起源和发展动力必须接受公开拷问^[7],这也正是对数字拜物教展开批判的原因所在。

二、存在论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数字拜物教的批判

对数字拜物教的批判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为代表的存在论批判(又称生产力批判)路径;二是在《资本论》及手稿中呈现出来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称生产关系批判)路径^{[3]123}。前者对整体物化现象展开总体性批判,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意识实现彻底变革,最终却走向主观主义;后者则指向数字的资本主义应用而非数字本身,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探寻能最大化发挥一般数据价值以服务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产方式。

1. 存在论批判: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为例

卢卡奇的拜物教批判以商品拜物教批判为核心,在将商品拜物教界定为现代资本主义特有问题的前提下,主张“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8],即以商品为核心的整体物化现象是卢卡奇拜物教批判的起点。实际上,选取商品拜物教而非货币或资本拜物教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吻合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批判视角,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其物化批判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距离。

面对整体物化现象,卢卡奇相应地提出了总体性批判的应对策略,指出如果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回避的现实的话,那么,对物化的克服也只能通过对矛盾总体的全面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将破除物化的革命任务移交给无产阶级。值得一提的是,晚年卢卡奇不仅意识到其青年时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还在其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试图对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产生的问题进行纠偏与补充,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他的物化批判理论。概而言之,晚年卢卡奇以劳动为出发点构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认为“人们可以在劳动中,而且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寻求并发现后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本体论形成过程”^{[9]115},基于此,晚年卢卡奇的物化观也发生了变化,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异化始终具有社会历史性”,“在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每一个时期中,发挥作用的各種现实社会力量会重新引起异化”^{[9]643}。但是,卢卡奇以劳动为媒介形成的对社会关系的关注最终还是被他纳入“总体”范畴之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

次返回到这种总体之中”^[10]。

在卢卡奇思想史中梳理其物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可见他始终未脱离从整体物化现象到总体性批判的大致路径,最终也未能逃脱主观主义的宿命,这一路径即为存在论批判路径。那么,对数字拜物教进行存在论批判会产生怎样的理论和现实后果呢?

基于存在论批判路径,在面对拜物教现象时,对卢卡奇而言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借助阶级斗争发动变革,而是对以物化现象为内容的抽象统治结构的总体性抵制。换言之,当数据成为崇拜对象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拜物教批判就直接指向数字技术本身,主张摒弃一切数字产品,并陷入“否定一切技术却维持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幻想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卸载微信、支付宝、美团、微博、抖音等软件,逃离网络社交、屏蔽电子信息、拒绝线上消费等个体行为并不是反抗数字拜物教的理性措施,这只会逐步剥夺反抗者的社会性,使其被大众默认的标准生活形态所遗漏甚至排挤。数字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而非最终形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将不断更新,它所带来的拜物教形式也必然不断变异,总体性的存在论批判只会将应对路径导向整体性的抵制,并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本主义幻想中不断陷入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怀念。而这一批判路径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呈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背道而驰。

2.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而后,在第二版跋中又主张政治经济学只有越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框定,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非“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才

能捍卫其科学性^{[1]16}。可见,就基本立场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且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形式的内在逻辑。

当资本历经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环节,完成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价值形式转变,并发展到无法消解其内在矛盾的阶段时,即资本在最大化地追求绝对剩余价值中,将工作日的长度延长至突破工人身心健康的底线,在无限度地追求相对剩余价值中,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至极端剥削和相对过剩人口泛滥并存,从而造成经济危机频发、贫困人口激增时,马克思也没有将生产力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同抹杀。《资本论》第三卷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总生产视野下,剖析资本运动产生的具体问题,以“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这一经济事实为导火索,引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隐藏的危机。随着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逐渐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与此同时,马克思坚定地捍卫这一变化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他始终未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定批判生产力本身,并将问题的产生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和过渡性的确证。

而在由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把资本主义总生产的视角和具体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也更完整、更成熟地呈现出来。因为在这一形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2]940},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危机以抽象统治结构的完整形式展现出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应当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2]994}。综上,在生产力发展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坚定地展现了其基本立场——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生产的成果,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驱动下揭露其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性,这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数字拜物教问题的联系仅仅依据以上阐述还不足以建立起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原始文本支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手稿》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抑或划分为“货币章”与“资本章”),分别载于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30卷和第31卷,而“机器论片段”归属于后半部分,即“资本章”结尾。这实际上就暗含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立场——在资本运动中阐述机器体系的剥削性质,从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探寻机器体系服务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空间。

具体来说,“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首先明确了机器体系与一般智力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相关性,指出机器体系这一发展成果“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11]92}。数字作为“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亦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运动,并且按照马克思的划分标准,大致可以将其划分到固定资本的范畴。虽然数字技术形塑了数字社会的各种现象,超越一般工具属性^[12],但仍未违背《资本论》语境中固定资本的基本含义。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界定,固定资本指的是在执行职能期间被一次性预付且在形成价值过程中逐渐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相应地,按照数字在形成数据产品时的周转方式来看,数字资本家在购置数据后便“一劳永逸”了,即使数字不同于传统的机器,它自身具有不

断更新的属性,更新所得也基于资本家的一次性支付而被永久私有。更为关键的是,数字在形成价值的过程中显然不是一次损耗的,其无限度、无成本的可复制性相较于传统固定资本更具生产性。因此,可以基本判定: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的界定和阐述对于理解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资料仍具有实质性参考价值。

当然,仅通过将数字划分为新型固定资本是无法跨越流通领域,真正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展开数字拜物教批判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数字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的归属问题。实际上,《资本论》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明确区分和定义是在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更具体来看,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关篇章中。马克思指出,“转变为生产资料且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的资本即为“不变资本”;而“转变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的资本则是“可变资本”^{[1]243}。依此划分标准,数字仍归属于不变资本的范畴,它本身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构成价值增殖运动的不可缺少部分。明确数字作为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属性,不仅直接起到了勾连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环节的作用,还回归到剩余价值生产的源头,澄清了数字拜物教的剥削性质,“机器论片段”中相关论述的借鉴意义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机器论片段”中最为核心的观点是:机器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它代替[活]劳动,而只是因为它是增加剩余劳动的手段”^{[1]170-171}。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场所和时间的界限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甚至突破了《资本论》的视阈,数字劳动不仅打破了工作与休闲时间的界限,甚至侵入了人们的睡眠时间,近期针对心理焦虑与睡眠质量问题而兴起的检测软件(如蜗牛睡眠、小睡眠、轻松睡眠等等),就是通过手机内置的传感器检测用户在睡眠状态中的体

动、呼吸和面部表情,并进行数据分析形成用户睡眠周期、睡眠程度等个性化报告。但是,监测用户睡眠质量并提供相应的改善意见并不是这类软件的目的,除通过插入广告和销售个性化服务盈利外,它们还将收集的数据信息出售给第三方——保险公司、医院等机构,以此来牟利。可见,数字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是在更大程度上压榨看似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其成为服务资本无限增殖的剩余劳动时间,且数字的渗透性更使得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趋向于被资本所包含和利用^[13]。

这实际上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11]245}。同理,数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发展永远无法抹灭或遮蔽其与数字劳动的根本对立,数字劳动也无法摆脱其异化劳动的宿命。因此,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数字拜物教盛行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摆脱主观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幻想,深入至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即立足于《资本论》及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和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问题(尤其是“机器论片段”)的经典论述,明确数字本身的工具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从而探索数字发展服务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另一种生产方式。

三、数字共同体:重建数字所有权

对数字拜物教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政治经济学描述,就意味着揭示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抽象统治、数字主体性丧失,控诉遮蔽劳资矛盾、掩盖新型剥削等后果,以及预判数字霸权的必然趋势,都不是其最终目标。对数字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其最终的思考方向应该由对数据私有的批判走向对数据共享的探索。因此,重建数据所有权,构建数字共同体才是对数字拜物教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然

走向。

1. 拜物教批判视域下的共同体发展

当然,在数字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走向数字共同体并不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幻想,它与《资本论》中蕴含的批判逻辑是相符合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中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进行揭示时,就已经指出商品形式及其所表现的关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90}。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来讨论拜物教问题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是从“物化批判”而非“物化观”的维度来回应拜物教,因为物化不是超历史的存在,它扎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马克思不仅要揭示物化现象产生的生产方式前提,更要为建构一种更有利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铺路。

而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的论述可以参考他关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论述。首先,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奴隶制、农奴制而言,更加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社会形态构成要素的创造。随后,马克思就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构成了更高阶的社会形态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成果既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中介性的。如果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上神坛,作为永恒的、终极的“物神”,它就失去了历史现实性而沦为一种观念或理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张在必然王国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控制他们的物质成果,从而使得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得以发挥,自由王国真正开始,真正的共同体成为现实。

因此,当数字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被揭示出来时,其历史性、暂时性和过渡性也就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内在矛盾的驱动下,将数字发展成果视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提供的生产条件,并作为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现实基础,才是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理解路径。其中,关键在于对数字这一新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展开批判,并寻求使数字共享成为可能的公有制基础,为数字共同体的构建创造现实平台。

2. 数字共同体的制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于此,社会主义与数字发展相融合就成为回应数字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现实出路之一,对此,我国进一步探索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结合方式。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并形成稳居世界第二的发展规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14]。可见,数字发展在我国已形成相当势头,但我国也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回应。

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制度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完全异质的制度形式,这也就意味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纳数字技术,在根本立场上规避了其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剥削性质,从而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发展成果。具体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技术打破时空壁垒勾连起来的用户群体就不会成为被资本逻辑压榨的阶级,而是形成致力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的雏形;数字发展所创造的时间就不会转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是成为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自由时间”;数字渗透下形成的意识也就不会局限为被资本引导的消费意识,而是发展为符合独立、平等、开放、共赢等原则的思想共识。换

言之,数字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不带有制度标识。而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确实能够引导数字时代的主体摆脱数字监控的全景布局和数字资本的隐形奴役,以联合性、解放性、斗争性的力量真正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4]351},也确实能够消除数字平台作为集中数据、处理数据、占有数据并从中榨取利润这一场所的剥削性质,使其过渡为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并共享数据的自由空间。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探求构建数字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一种具体尝试,也是动摇数字拜物教这一资本拜物教新形式根基的有力举措。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将推进数字产业发展同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相结合,在实践层面保留数字发展的成果,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物质基础,也为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真正的共同体”积累现实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 [4] 王海稳,马晓媚,等.数字资本主义建构逻辑的批判与超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
- [5] 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M].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 [6]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M].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64.
- [7] 希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M].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9.
- [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2.
- [9]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 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M].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10]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M].白锡堃,张西平,李秋零,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648.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2] 温旭.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10.
- [13] CHRISTIAN F.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The Routledge Press, 2014: 268.
- [14]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当代江西,2022(2):3-7.

[责任编辑:侯圣伟 聂海杰]



引用格式:郑清清.数字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资本论》及手稿[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2):20-28.